

北京图书馆藏宋版书叙录 (九)

李致忠

《童溪王先生易传》三十卷 宋王宗传撰 宋开禧元年建安刘日新宅三桂堂刻本 存二十二卷（一至十四、十八至二十二、二十八至三十）每半叶十四行，行二十四字，细黑口，左右双边。

王宗传，字景孟，宁德人。淳熙八年（1181）进士，官韶州州学教授。据《天禄琳琅书目续编》著录，原书第二十七卷前亦曾有王宗传自序，谓“‘岁在戊戌，著《易》计三十卷。其于《系辞》《序卦》《杂卦》未暇也。越三载辛丑，蒙恩赐第还乡，作《续传》’。然《续传》仅有《系辞》上下传，其书终未成也。”今其书，前二十六卷为上下二经，后四卷为《系辞》上下传。与王宗传自序及《天禄琳琅书目续编》所说相合。所谓“岁在戊戌”，当指淳熙五年（1178）之戊戌，不可能是前此或后此之戊戌。若是前此之戊戌，就要提前到北宋徽宗政和八年（1118）。那时王宗传尚未出生。若是后此之戊戌，就到了南宋理宗嘉熙二年（1238）。这时王宗传可能早已作古了。因此，其自序中所谓“岁在戊戌”，定是淳熙五年之戊戌。而这一年王宗传还未登进士第，实际已经开始《易》学研究并著而成书了。然于《系辞》、《序卦》、《杂卦》，还未来得及加以训释。“越三载辛丑，蒙恩赐第还乡，作《续传》。”即自淳熙五年戊戌算起，越三载正

是辛丑，即淳熙八年（1181），“蒙恩赐第还乡”，有了时间和余力，故“作《续传》”。但现存此书仅有《系辞》上下传，故《天禄琳琅书目续编》推断“其书终未成也”。按上引王氏自序，已谓“岁在戊戌，著《易》计三十卷”，加上赐第还乡后续传之《系辞》二卷，全书当为三十二卷。故朱彝尊《经义考》引述董真卿话说：“宗传字景孟，临安人，太学上舍《易传》三十二卷，淳熙丙午林焯作序。”然现存宋刻此书，却是三十卷。盖刻书时改变分卷旧第，合为三十卷。

王宗传治学严谨，不下轻议之笔。他在书前自序中说：“《易》，不可以易言也。盖自汉魏以来，世之言《易》者特多于他经，而其失也比之言他经者亦多，此其故何也？易而言之之故也。夫人之情有所难乎也，则必有所畏，谨乎此，而后获免轻议乎此之失。苟惟有所易也，则将争奇竞巧，而不知中庸之为至德；骋私任臆，而不知正直之为王道。如是则择焉不精，语焉不详，贸贸然不知朱紫苗莠之固有其辨，而吠声觊影之流，始受其误矣。昔者夫子盖尝致谨乎此也，观其言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夫学《易》而可以无易之过，此岂童心浅识者之所能为也，故圣如夫子，亦曰吾犹有待焉耳。……余不敏，一经之教奉以周旋有日矣。然学愈久而心愈杂，故虽疲神剔思，于此非不勤且至也，而未尝敢下轻议之笔。虽然，抑尝思之，加我之年，亦行甫及矣。”足见王宗传治学态度之严谨，及传《易》之功力。故其友林焯为之序曰：“余与童溪生同方，学同学，同及辛丑第，知其出处甚详。公性能酒饮，已辄论《易》。尝曰吾远祖文中不善辨，为负苓者诟。使与我遇，当瞠目张胆灭其苓而讥之曰：‘尔不有于人，又何有于身！’自是与人言《易》不倦，而于二系为详。出其门者十九青紫。既第之三年，教授曲江，越二年而书成。大书其影曰三年之卷《易》书，自谓无愧三圣，其笃于自信者欤！”按林焯写这篇序文时的结衔为“儒林郎

知瞿州开化县主管劝农公事”。他的字是炳叔，亦宁德人，故与童溪称为“生同方”。又尝同学，共同举进，且同于辛丑年登进士第，故又曰“学同学，同及辛丑第”。其实在南宋孝宗淳熙八年辛丑（1181）考进士时，林惇并未正式中第，而是以特奏名的身分跻身于进士之林。宋代自太祖赵匡胤时候起，对多次科考而久不中式者采取了特殊政策。认为这种人为了仕进科举，多年苦读，学亦不讲，业更难精，困顿风尘，潦倒场屋，若不给予特殊恩赐，无益奖掖来者，故特赐进士及第。此后成为定制，有宋一代，凡如此得到进士身分者，通称为“特奏名”。林惇所谓与王宗传“同及辛丑第”，暗中高抬了自己，实际是个没考中进士的进士。故其序王氏《易传》，描述成书经过，称颂学术水平，褒扬王氏品格，亦难免有偏爱之嫌。“宗传之说，大概桃梁孟而宗王弼，故其书惟凭心悟，力斥象数之弊，至譬于误注《本草》之杀人。惇序述宗传之论，有性本无说，圣人本无言之语，不免涉于异学。与杨简慈湖《易传》宗旨相同。盖弼《易》祖尚玄虚，以阐发义理，汉学至是而始变。宋儒扫除古法，实从是萌芽。然胡程祖其义理，而归诸人事，故似浅近而醇实。宗传及简祖其元虚，而索诸性天，故似高深而幻眇”（见《四库全书总目》关于《童溪易传》提要）。这是距王氏《易传》之后六百余年清代四库馆臣们的看法。俗谓旁观者清。

此书定为宋开禧元年（1205）建安刘日新宅三桂堂刻本，根据有二：其一，是该书王宗传自序后镌有牌记，文曰：“建安刘日新宅侵梓于三桂堂”。这是直接有力的证据。其二，是该书林惇序谓：“开禧更元，族子驺客武陵，以书来曰刘君日新将以《童溪易传》膏馥天下后世。”这亦是有力的旁证。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三《宋私宅家塾刻书》一节谓“建安刘日新宅，开禧更元刻王宗传《童溪易传》三十卷，见《天禄琳琅后编》二。云自序后有墨印三：一曰‘大易发明’，一曰‘建安刘日新宅侵梓于’

三桂堂’，一曰‘经学之宝’。”与此书正合。因检《天禄琳琅书目续编》卷二，的确著录了此书。并谓：“《童溪先生易传》二函，十二册。宋王宗传撰。宗传字景孟，宁德人。淳熙八年进士。……自序后有墨印三：一曰‘大易发明’，一曰‘建安刘日新宅钁梓于三桂堂’，一曰‘经学之宝’。又有林惇炳叔序，自称与童溪生同方，学同学，同及辛丑第。开禧更元，刘君日新将以《童溪易传》膏馥后世。是书纂于孝宗朝刊于宁宗朝。此其付梓时所序也；惇字炳叔，宁德人，淳熙辛丑特奏名。官开化令。宋孝宗讳昀，古慎字。宋本诸《易》经多于‘慎不害也’句阙笔，盖言‘慎也’句改顺。此独作‘谨不害也’，盖言谨也。与诸刻不同。是书传流印记甚夥。”这段文字非但证明叶德辉的说法不无根据，也证明此书确曾是天禄琳琅的旧物。

刘日新的家世与刻书情况，难以稽考。是否与建安望族刘氏有关，不敢武断推测。清康熙时纂修的《建安县志》卷八艺文类，收有一篇明朝人滕祐撰写的《五忠堂记》，谓“郡之望曰刘氏；其先仕唐宋为显官者不知凡几百人。其功烈炳著，以忠名世者，合二族得五人焉。其所自出，则汉楚元王之裔。由京兆迁入闽，曰翔者居崇安之五夫；曰翺者居建阳之麻沙。翔八世孙曰𡗗……𡗗生子羽……子羽生珙，此皆五夫之刘，世曰东族也。翺七世孙曰颀。……又十二世而生纯，绍定间知邵武县……。此皆麻沙之刘，世谓西族也。”刘日新是否与这两族有关，虽不敢做出明确的结论，但恐亦不能说与这两族无关。在宋代，特别是南宋，福建是全国著名的三大刻书中心之一，而主要的集中地，则是闽北的建阳、崇安、建宁、建安、瓯宁一带。此地斜依武夷山，茂林修竹，是造纸的好材料。加之东西溪水纵贯南北，汇合于建安瓯宁，是造纸业兴盛发达的天然条件。有竹造纸，有木雕板，构成了这一地区雕板印书发达的良好基础。故此地以刻书为业者不胜枚举，其中刘氏便是不可忽视的一家。如麻沙镇水南刘仲吉宅于

绍兴三十年（1160）刻过《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乾道间又刻过《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五十卷；建安刘元起家塾之敬室刻过《后汉书》一百二十卷，刘通判宅仰高堂刻过《纂图分门类题五臣注扬子法言》十卷，建安刘叔刚宅刻过《附释音礼记注疏》六十三卷，建安刘日新宅三桂堂于开禧元年则刻印了这部《童溪易传》三十卷。这就是说，我们虽然考不出刘日新的家世行实及业书状况，但当着将闽建刘氏远祖情况及刘氏支裔的刻书背景做了上述交待后，则刘日新宅三桂堂于开禧更元刻印王氏《童溪易传》，便觉得是很自然很可信的事情了。前边说过了，王宗传《童溪易传》盖在淳熙八年（1181）稍后成书，二十四年后，即开禧元年（1205）始镌板印行。故《天禄琳琅书目续编》谓“是书纂于孝宗朝，刊于宁宗朝。”实谓此本是此书的初刻本。今虽有残，但仍存大部分，使我们得窥此书之宋时旧貌。且流传有自，递藏有家，更增添了它的文物价值与版本价值。

今观此书，钤有“俞贞木”“锡山秦汴”“次山秦思宋”“少保秦端敏公仲子”“唐伯虎”“立菴”“立菴图书”“毛晋私印”“汲古主人”“毛氏子晋”“汲古得修绠”“汲古阁”“莆伯”“谦牧堂藏书记”、“谦牧堂书画记”、“乾学”“健菴”“五福五代堂宝”“八徵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乾隆御览之宝”“天禄继鉴”等印记。俞贞木，字有立，明吴县人。永乐初年以劝苏州守姚善举兵而论死。此书钤有他的印记，表明此书明初已为名家所收藏。秦汴，字思宋，无锡人，秦金仲子。秦金字国声，弘治进士，官刑部尚书，卒谥端敏。故书中所钤“锡山秦汴”“次山秦思宋”“少保秦端敏公仲子”，都是秦汴的藏书印记。“唐伯虎”是唐寅的印记。立菴是贺万祚的号，秀水人，天启朝布政使，故书中所钤“立菴”、“立菴图书”印记，都是贺万祚的藏书印鉴。“毛晋私印”“毛氏子晋”“汲古主人”“汲古得修绠”等印记，都是明末毛氏汲古阁的藏书印

鉴。“毛褭”“莆伯”，是毛晋之子毛褭的藏书印记。毛褭字莆伯。足见此书在明代就曾递经五大名家收藏。入清后又先后为揆叙、徐乾学所收藏。“谦牧堂藏书记”“谦牧堂书画记”，都是揆叙的藏书印记。揆叙是满州正白旗人，字恺千，号惟实居士。康熙时官至左都御史。卒谥文端。“健菴”“乾学”是徐乾学的藏书印记。徐乾学字原一，号健菴。康熙九年（1670）进士第三人及第，官刑部尚书。家富藏书。尝筑楼于所居之后，凡七楹，斫木为厨，贮书若干万卷。部居类汇，各以其次。素标细帙，启钥烂然。尝与其子登楼观书，曰“吾何以传汝曹哉？”因指书而欣然笑曰：“所传者惟是矣”。遂名其楼为传是楼。此书在清初又经这两人所收藏，其身价亦与之倍增。至于那几颗玉玺大印，则是天禄琳琅藏书的明显特征。天禄琳琅是清朝内府的皇家藏书，书藏的版本、书品都极其考究。此本曾荣登皇家册府，亦是其珍贵之处。天禄琳琅藏书散出后，此本辗转又归藏于陈清华，故书中又钤有“祁阳陈澄中藏书记”。陈澄中多年寓居香港，其藏书曾有过两次较大规模的出让。此书盖是其出让过程中，北京图书馆购藏的。

中国的古书、字、画，其价值如何，除本身的优长之外，还常常要看有没有考据。这虽然是一句过去书铺子、古玩字画店中的行话，但也反映了当时文人墨客、收藏家、鉴赏家们的着眼点。所谓有没有考据，包含着见不见著录、有没有名人批校题跋、有无名家藏书印记。有这些考据，一方面表明其流传有自，绝非赝品，另一方面又因有名人题咏、校迹、印鉴而锦上添花，更加珍贵。此本递藏有绪，印记琳琅，灿然悦目，典雅古朴，因而也就显得更加珍贵。

《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六卷 宋蔡沈撰 《书传问答》一卷 宋淳祐十年（1250）吕遇龙上饶郡学刻本。每半叶

八行，行十八字，小字双行同，上下细黑口，左右双边。

蔡沈，字仲默，号九峰，福建建阳人。生于南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卒于南宋理宗绍定三年（1230），享年六十三岁。蔡沈，是蔡元定的小儿子。蔡元定字季通，是蔡发的儿子，幼承庭训，长从朱熹游。朱熹扣其学，大惊曰：“此吾老友也，不当在弟子列”，遂与对榻讲论经义，每至夜分。四方求学者，必俾先从元定质正。韩侂胄兴伪学之禁，元定被贬谪道州。至春陵，远近来学者日众。尝登西山绝顶，忍饥读书，学者称西山先生。蔡沈，少亦游朱熹之门。年三十，便屏去举子业，一以圣贤为师。隐居九峯，当世名卿物色，将荐用之，终不肯就。朱熹晚年尝欲作《书传》，未及为，遂以属沈。《洪范》之数，学者久失其传，惟蔡元定独心得之，然亦未及论著，故亦曰“成吾书者沈也。”蔡沈受父、师之托，沉潜反复者数十年，然后成书，发明先儒之所未及。该书蔡沈自序云：“庆元己未冬，先生文公命沈作《书集传》。明年，先生歿。又十年始克成编。”庆元己未，即南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这一年蔡沈受命于朱熹，开始作《书集传》。第二年，即庆元六年（1200），朱熹便与世长辞了。又十年，应当是嘉定三年（1210），始克成编。前后大约花费了十二个年头。

然该书所载其子蔡抗《面圣表》又谓：“淳祐丁未八月二十六日，臣抗面对延和殿所得圣语，臣抗奏二札节次蒙圣谕，臣奏毕，又蒙玉音，宣问臣前缴进奏札，臣再一一奏毕。遂奏臣犬马之情切于爱主，久怀耿耿无自指陈。兹侍清光，尽抒缱抱，臣退归山林，死无悔恨。玉音忽云：‘卿前日所进《尚书解》，朕常看其间甚好，是卿之父？’臣奏‘臣先臣沈辛勤三十年，著成此书。今遇陛下赐之乙览，九原知幸，千载光荣’。玉音云：‘正是从朱熹学？’臣奏：‘先臣此书，皆是朱熹之意。朱熹晚年训传，诸经略备，独《书》未有训解。以先臣从游最久，遂以大意令具

稿而自订之。今朱熹删改亲笔一一具存’。”

一个是蔡沈自序，说为给《尚书》作传，前后花了十二年功夫；一个是其子面圣口述，说是蔡沈作《书集传》，辛勤三十年，著成此书。两者的差距很大，龃龉明显。盖蔡沈专习《尚书》历数十年，其自序所说盖指自受父师之托，正式作《书集传》算起；其子所谓盖连其专习潜研的时间亦计算在内，故说“辛勤三十年，著成此书。”《四库全书总目》谓“真德秀作沈墓志，称数十年然后克成，盖衍一数字。”这种判断是只顾自序所言，而未顾其专习潜研的时间。殊不知自序所言成书的时间及其子和真德秀所言成书过程，角度不同，指陈不同。

这里还有个实质性的矛盾，即所谓朱熹订正问题。按《书集传》蔡沈自序所言：“庆元己未冬，先生文公命沈作《书集传》。明年，先生歿。又十年，始克成编。”这就是说，庆元五年（己未1199）的冬天，朱熹始命蔡沈作《书集传》，翌年，朱熹便与世长辞了。中间不过一年的时间。要订正十年后始克成编的《书集传》，岂不滑稽！故蔡抗《面圣表》中所谓“朱熹晚年训传，诸经略备，独《书》未有训解。以先臣从游最久，遂以大意令具稿而自订之。今朱熹删改亲笔一一具存。”其说究竟有多大的可信程度，实是问题。于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提出异议：

“沈序称《二典》《三谟》经朱子点定。然董鼎《纂注》于正月朔旦条下注曰：‘朱子亲集《书传》，自孔序止此，其大义悉口授蔡氏，併亲稿百馀段，俾足成之，则《大禹谟》犹未全竣。序所云《二典》、《三谟》特约举之辞。’鼎又引陈栎之言曰：‘朱子订《传》原本有曰正月，次年正月也。神宗，说肃以为舜祖顓琐而宗尧，因以神宗为尧庙，未知是否。如帝之初等，盖未尝质言为尧庙。今本云云，其朱子后自改乎，抑蔡氏所改乎？’则序所谓朱子点定者，亦不免有所窜易，故宋末黄景昌等各有正误辨疑之作。”足见所谓朱文公订正《书集传》，自宋末以来早有疑

问。

然此书各卷均分别今文、古文，且去汉唐以来的烦琐考据，而以简明的文字对经文加以训释，所以较伪《尚书孔氏传》更为清晰。同时又能继承朱熹的理学传统，宣扬心学心法，提倡德、仁、敬、诚。但在具体的训解行文中，于某些文字词义的解释，与朱熹又有所不同，并纠正不少误解，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因此，自元仁宗皇庆（1312—1313）时与朱熹《周易本义》、胡安国《春秋传》等并列为学官以后，直至清末废止科举，蔡氏《书集传》一直是举子们试士的标准注本。所以此书自问世以来的六百余年中，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确是一部影响广阔而久远的解《书》之作。朱彝尊《经义考》引黄震话称：“经解惟《书》最多。至蔡九峯，参合诸儒要说，尝经朱文公订正。其释文义，既视汉唐为精，其发指趣，又视诸家为的。《书经》至是而大明，如揭日月。”故历来版刻、传抄极夥。

蔡抗《面圣表》谓：“玉音云：‘曾刊行？’臣奏坊中板行已久，蜀中亦曾板行，今家有其书。”蔡抗这段表述，说的是他把蔡沈《书集传》进呈之后，宋理宗赵昀于淳祐丁未（七年1247）八月二十六日在延和殿召见他时的问答。我们从这个简单的问答中，可知此书宋时就有坊间刻本，亦有蜀中刻本。前边曾说过了，蔡沈《书集传》成编，约在嘉定三年（1210）。而其子蔡抗进呈此书则在淳祐七年（1247）的八月，而理宗皇帝召见蔡抗于延和殿，问及此书曾否刊行，就在《书集传》进呈的当月，即淳祐七年的八月二十六日。这中间相隔三十七年。因此，可以这样认为：一是该书进呈乙览、荣登册府之前，就已有了刻本流行，且不只一种版本在流通，有坊刻本，也有蜀中刻本。二是这些刻本之梓行，既不会早于嘉定三年成书之前，亦不会晚于淳祐七年八月此书进呈面圣之后，必是嘉定三年至淳祐之间的刻本。且坊本最早，蜀本次之。所以蔡抗《面圣表》中才说“坊中板行已

久，蜀中亦曾板行。”足见《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之首刻本是书坊刻本，其次是蜀刻本。傅增湘先生《藏园群书经眼录》谓：“据吕跋称倚席上饶，侵梓学宫云云，则为上饶郡学所刊，为是书第一刻”的说法，根据是不足的。也就是说吕遇龙上饶郡学刻本，并不是此书的第一个刻本，而应该是已知的第三个刻本。如果一定要说吕遇龙上饶郡学刻本，是此书的第一个刻本，那也只能说是蔡氏《书集传》进呈后的第一个刻本，而绝不能以此本概括为此书的第一个刻本。惜前两个版本久已失传，故本文所要介绍的这个吕遇龙上饶郡学刻本，便成了蔡氏《书集传》现存传世最早的刻本。而且举世孤罕，弥足珍贵。

此本首为进书表，落款及结衔为“淳祐七年八月日奉议郎秘书省著作佐郎兼权侍右郎官兼枢密院编修官兼诸王宫大小学教授臣蔡抗上表”。次为淳祐七年八月二十六日蔡抗面圣表。次为后省看详文牒，落款及结衔为“淳祐八年二月日朝请郎权尚书吏部侍郎兼权中书舍人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兼侍讲赵汝腾状”。次为《书传问答》。次为《书传问答蔡抗跋》。次为《九峯蔡先生书集传序》。次为正文。为每半叶十行，行十八字，小字注文双行同。上下细黑口，左右双边。版心上镌字数，上鱼尾下记书传×，下鱼尾下记叶数，最下镌刊工姓名。卷四、卷五后分别镌“淳祐庚戌季秋金华后学吕遇龙校正刊于上饶郡学之极高明”二行。全书卷尾有绍定壬辰长至后十日后学黄自然跋·孙监跋·吕遇龙跋。其中吕遇龙跋称：“伊川先生以《春秋传》属刘质夫。既成，门人请观。先生曰‘却须着谋亲吁亦难矣。’文公晚年，训传略备，下至《离骚》，且为之辨证，而帝王之书独以九峯。先生曰：‘只等蔡仲默来便了。’文公岂轻所付哉！斯《传》上经乙览，四方人士争欲得而诵之，犹惧其售本之未善也。遇龙倚席上饶，际先生的嗣久轩先生为部绣衣，茂明家学，而遇龙得以承教焉。遂从考质，侵梓学宫。观者能以一时师友问答求之，则知其

不专于训诂也。淳祐庚戌九月既望后学金华吕遇龙敬书。”

我们已经知道，蔡沈《书集传》进呈乙览，是在淳祐丁未（七年1247）八月。封建社会文人士大夫的著作，一经进呈，荣登册府，便若鱼跃龙门，身价十倍。这恐怕是当时的事实。推其原因：一是此书之作是朱熹授意的，并且由他自己亲笔订正。众所周知，朱熹是宋代的理学大师，官方哲学的代表人物。他授意纂注并亲加订正的《书集传》，自然已影响很大。二是经过蔡沈之子蔡抗的努力，此书又于淳祐七年得以进呈乙览，并且得到理宗皇帝的好评。正如《面圣表》中所说：“卿前日所进《尚书解》，朕常看其间甚好”。本来就很有影响的书，又得到皇帝的赞许，当然会引得“四方人士争欲得而诵之。”一书有无销路，历来是出版与否的前题，这是古今通理。此书在当时既已为士人所争诵，又恐怕书坊趋利售本之未善，这就构成了吕遇龙要刊印此书的具体背景。

吕遇龙事迹不详。其跋自称尝“倚席上饶”，显然是在上饶做过地方小官。而他在上饶任上时，又“际先生的嗣久轩先生”，故“得以承教”，并“遂从考质”，将蔡沈《书集传》“侵梓学宫”。这里的所谓“际先生的嗣久轩先生”，指的是吕遇龙在上饶为官时，正遇到蔡沈先生的儿子蔡抗也来上饶。蔡抗字仲节，号久轩，绍定进士。博通经史，邃于理学。累迁诸王教授，官至参知政事。尝上疏言权奸不可复用，国本不可不早定。很得皇帝认同。卒谥文肃。三年前将蔡沈《书集传》进呈乙览的蔡抗，三年后在上饶与吕遇龙相遇。两人志同道合，对《书集传》再次考质后，于淳祐庚戌（十年1250）九月镌板印行于上饶郡学。这一点，从卷四、五后所镌刻书题记，及卷尾吕遇龙跋文都已得到证明，无庸置疑。

关于上饶郡学，〔康熙〕《新修上饶县志》卷三谓：“旧创于郡西北隅。宋景德三年，州守杨举正迁于郡城之东。殿堂斋

庀，建置如度。有青阳楷记。庆历四年，州守张铸以学制弗称，拓而新之，且请题署于朝。元丰五年，转运判官郑亶知州事，杨仲儒复加修葺。于是经史有阁，教授有堂，诸生有舍，庖湫庾库，各有其所。有孔武仲记。学门旧面正南，元祐间徙建东南，以挹琅琊诸峯之秀。南渡后，天下多故，转为驿馆。教授周之才请于郡，复之。自为记。淳熙十年，知州事钱象祖再新，有王宁记。绍熙五年，教授林至按礼图定先圣先师诸贤位次，有朱晦翁记。嘉定、端平间，递加葺治，又增朱、吕、二陆之祠，订定朱子释奠礼仪品式，有何处恬、陈文蔚记。”足见上饶郡学，是座历史悠久，迭经修葺，建置有度，释奠合仪的郡学。直至嘉定、端平间还在递加葺治，增建贤祠。而端平距淳祐十年仅有十三、四年的时间，故吕遇龙在此开雕蔡沈《书集传》时，当是该郡学复兴的时期，故雕印精良，校勘精审，堪称佳善。

该本铃有“安乐堂藏书记”“东郡宋存书室珍藏”两印记。因知此书曾为允祥、杨绍和收藏。“安乐堂”是清宗室允祥的藏书之处，有安乐堂藏书印记，表明此书曾是允祥的架上之物。允祥是清圣祖康熙皇帝的第二十二子，世宗雍正时封为怡亲王，领户部。以奏减苏松赋，加征嘉湖南昌赋，疏浚畿甸河渠，开垦荒地，明决大狱而著名，卒谥贤。“东郡宋存书室珍藏”，是聊城杨氏海源阁的藏书印。然杨氏《楹书隅录》未予著录，故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谓其为“聊城杨氏海源阁遗籍”。后从海源阁流出，辗转归藏于北京图书馆。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图书馆业务处

（本文责任编辑：毛华轩）